

## 全球化：西方中心抑或世界共同體？ ——《面紗》與《通天塔》比較研究

◎ 吳海清 張建珍

全球化已經成為當代文化敘述中的一個關鍵現象和重要理論，也是當代電影文化中頗為激動人心的範疇，人們既擔憂全球化會逐漸蠶食各種文化傳統，也熱切期盼全球化會帶來人類文化的空前解放和全球共同體的生成。多元化和普遍主義成為人們思考全球化時最難以處理的現實與理論困境。一方面強調文化多元，另一方面具有強烈的全球整合與規範衝動；一方面是各種文化之間的交流與理解，另一方面是要在新意義上轉譯各種文化；一方面是不同文化之間的互滲與彼此促進，另一方是強勢文化不斷地進入其他文化領域，對後者進行重新發掘、反思、批判與整合。如此複雜的、又自相矛盾的困境決定了當代人們關於世界關係的再現也無法避開這一矛盾，更重要的是，這一矛盾成為當下文化再現的核心問題之一。下面想比較一下2006年的兩部影片，一部是中美合拍的《面紗》，一部是《Babel》（漢語譯名《通天塔》），看看它們是如何在全球化語境中再現不同民族、不同國家的形象。儘管這兩部電影表現的時代和文化都有很大的差異，但兩部片在全球化想像方面確有異曲同工之處。

### 一 《面紗》：疾病化中國與全球化中國

電影《面紗》講述了一對年輕的英國夫婦在1920年代來到中國鄉村生活的故事。在這美麗卻兇險的環境中，他們經歷了在英國舒適生活中絕對無法想像和體驗的情感波瀾，並領悟到了愛與奉獻的真諦。故事以女主角吉蒂開篇，為了逃離20年代倫敦浮華卻又空虛的社交圈，也為了防止自己變成一位老姑娘，吉蒂接受了沉默寡言的醫生沃特·費恩的求婚。費恩在把吉蒂帶到上海後，便迅速地投入到了他的細菌學研究中去。孤獨的吉蒂和迷人的已婚男子查理·唐森發生了婚外情，當費恩發現時，他羞恨交加。為了報復，也為了重整自己的生活，費恩決定孤注一擲，帶著吉蒂遠走霍亂肆虐的偏遠城鎮。從一塵不染的研究室走向了瘟疫流行的最前線，他慢慢地協助控制了當地的疫情。這個處在瘟疫中的小鎮在費恩來到以前正處在恐慌之中，鏡頭渲染了感染瘟疫的人一個接一個的死亡。即使如此，小鎮的人卻對瘟疫沒有真正的認識。他們依然處在迷信之中，認為瘟疫是天對人的懲罰，祈求神靈和巫術，不將瘟疫作為一種醫學現象來加以治療。他們還執著於傳統的觀念，不願將感染瘟疫而死的人進行火化或者深埋，反而將這些死者葬於水源附近，導致了瘟疫更加嚴重的傳播。而軍閥將這個地方視為自己的禁臠，反對政府軍為了防止瘟疫進駐這個地方，甚至阻礙沃特採取科學的方式預防與治療瘟疫。該地的教會對瘟疫也是無能為力，牧師甚至不滿意小鎮的封閉和生活的枯燥無聊，屢屢抨擊小鎮的混亂、愚昧與生活的寂寞，雖然有一個他曾經救過的、頗具異域之美的中國姑娘死心塌地得跟著他。

在沃特的說服和具有西方文化背景政府軍團長的幫助下，沃特開始通過科學的方式來預防

和治療當地的瘟疫。他改變了人們習慣飲用被污染的河流中的水，從山上引水下來。他也說服人們將感染瘟疫的人火化。他工作的效果說服了當地人，瘟疫得到了控制。在預防與治療瘟疫的過程中，沃特和吉蒂的關係也在發生變化。儘管吉蒂一開始對小鎮的生活充滿反感，還始終惦記著上海的查理·唐森，但當牧師告訴她查理·唐森對待情感一向不認真後，吉蒂開始明白查理·唐森不會將自己帶出偏僻小鎮。吉蒂開始在一家由法國修女主持的修道院兼醫院中做義工，並逐漸找回了生活的勇氣和意義。沃特的工作態度、犧牲精神以及逐漸變化的情感也在影響著吉蒂。沃特和吉蒂終於可以互相敞開心扉，但就在他們日漸親密的同時，沃特染上了霍亂。因為治療霍亂的藥不夠充分，沃特最後不治而逝。沃特之死決定了他們新近迸發出來的激情能否轉化為永恆的愛情。影片結束在吉蒂回到祖國，帶著孩子在街上遇到查理·唐森，她平靜地拒絕了後者重修舊情的要求。

這是一部情感傳奇的影片。從最初沒有真正的愛情而結合，到發生婚外情，再到沃特帶著吉蒂到瘟疫氾濫之地，以懲罰她的不忠，隨之兩人發生真正的情感，沃特感染霍亂而逝，吉蒂堅守這份情感，帶著孩子回到祖國生活：整個影片無疑是以兩人之間的情感為主體。不僅如此，這部影片還將故事放在偏僻、陌生、瘟疫、戰爭、敵視、拯救的環境中展開，演繹一曲無奈、背叛、懲罰、新生等情感過程，具有色彩斑斕的傳奇性。儘管如此，如果僅僅將這部影片看作情感傳奇片，則會忽視其所蘊含更豐富的文化資訊，因為吉蒂與沃特兩人之間情感的變化涉及到中國內地，也涉及到瘟疫，中國內地及其發生的瘟疫都不是單純作為情感故事的背景和變化的原因，而是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表現對象。簡單說，影片中沃特是作為一個科學工作者、作為一個醫療者、作為一個拯救者、作為一個犧牲者來到中國內地。而中國內地則成為一個充滿迷信、戰亂、落後、閉塞、麻木、無序的存在。沃特出現在這樣的環境中，通過自己的冒險、艱難的勸說和科學知識改變了這個地方受霍亂威脅的情況和人們的愚昧，更通過犧牲將預防與治療霍亂的行為變成了超越科學的神聖而崇高的啟蒙與拯救歷史，與此同時，他與吉蒂的情感則賦予這次拯救行為以浪漫的情韻。這意味著沃特將傳教士、啟蒙者、科學家、受難者、有情人的身份集合在一起。這是西方文化在中國尤其是民間傳播、被人們接受，並逐漸獲得承認的一種重要的方式。<sup>1</sup>

值得注意的是，影片再現中國內地的方式以及人們關於中國內地的言談。首先，影片將中國內地與瘟疫聯繫在一起。影片中，才華橫溢的沃特從英國來到上海，希望在中國實現自己科學家的人生設計，但這首先要有一個可以施展這種才華的機會，然而這時期的中國無疑沒有一個科學家從事正常研究工作的環境。因此，真正要實現沃特的生物學研究的理想恰恰需要一個異常的環境，瘟疫為沃特提供了這樣的機會。儘管影片似乎為瘟疫的敘述提供了一個充分的理由，那就是沃特要將吉蒂帶到困難之所，以此懲罰吉蒂的不忠。但無論是沃特、吉蒂，還是其他在上海的外國人，他們敘述中國、尤其是正在發生瘟疫的地方時，都沒有將這個地方僅僅作為發生瘟疫的地方來敘述，而是將這個地方作為一個懲罰之所，一個與現代生活隔絕的場所，一個充滿恐怖、閉塞和難以想像的寂寞之所，一個貧窮、落後、死亡聚集的場所。這樣一來，瘟疫就不是一個單純的疾病現象，而是一個具有意識形態意義的隱喻。當沃特他們來到發生瘟疫的地方時，影片通過多種敘述將這個地方疾病化。大量的鏡頭在表現著一個接一個抬著感染瘟疫而死亡的人；傳教士一再敘述自己在這個地方孤寂、難以有真正的精神溝通的生活；國民軍的軍官對這個地方的軍閥和鄉民大加鞭撻，再加上木訥的衛士、近乎暴民的鄉民、吉蒂將要瘋狂的精神狀態，這個地方無序、貧窮、暴力、愚昧、閉塞的病態形象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表現。從一個現代西方的視野看來，這裏不僅沒有民主、自由等現代社會的主導價值，沒有人性、科學等現代社會值得珍惜的價值，更重要的是這裏連正常的社會秩序、普通的生存環境以及健康的人都沒有。這是一個完全為精神疾病、文明疾病和身體疾病

所控制的世界。

這種將中國、尤其是中國內地疾病化的修辭在現代西方關於中國的敘事中是屢見不鮮的現象。從19世紀晚期傳教士開始將中國國民性作疾病化修辭的開始，人們一再通過疾病形象來敘述中國。這種疾病化中國的修辭甚至成為中國人自我敘述的無意識模式。《老殘遊記》中，遊醫老殘就是在不斷地診斷與治療中國的疾病。魯迅的《藥》將中國描述成癆病者形象，並且是一個缺乏科學知識、通過迷信方式治療中國癆病的形象，其結果只能是死亡。胡適在1930年代前後則將貧窮等視為影響中國社會現代化的五種疾病。新時期一開始，劉心武的《班主任》就將文化大革命敘述成一個病態的歷史過程。韓少功的《爸爸爸》中丙崽更是一個弱智、發育不全的形象。崔健的一句「我的病就是沒有感覺」更是將中國文化感性壓制、自由喪失的疾病徹底揭示出來。即使1990年代之後，將中國疾病化的修辭依然出現在眾多的中國形象敘述中，賈平凹的《廢都》、田壯壯的《小城之春》、張揚的《洗澡》等都通過肺病、弱智等形象來隱喻中國。

從這種意義上說，《面紗》還在延續著現代修辭中將中國形象疾病化的傳統。事實上，西方的中國敘述也不乏將中國疾病化的傳統。從傳教士作東亞病夫的診斷，從賽珍珠的《大地》到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從專制中國到混戰中國，從革命中國到紅色瘋狂中國，從東方神秘中國到人道災難的中國，從「非典」中國到大國威脅的中國：中國作為文明與現代社會秩序的一個病態和瘟疫存在的修辭一直伴隨著西方關於中國的敘述，非理性中國更是令西方世界恐懼的形象。<sup>2</sup>中國要麼因其龐大的帝國專制秩序成為現代文明中的一個衰敗的、百病纏身的存在，要麼因為戰亂頻仍而成為現代社會中精神錯亂的存在，要麼因為革命不斷成為現代歷史中狂熱的存在，要麼因為缺乏公平與透明精神而成為現代民主社會秩序的極端威脅。<sup>3</sup>在《火燒圓明園》中，這種病態化中國的修辭不僅體現在宮廷中，也體現在整個社會社會中。因而，《面紗》的疾病化中國修辭也是西方的中國形象敘述傳統的延續。在《面紗》中，內地中國幾乎集中了中國與西方現代修辭中關於種種疾病化中國的主要內容，瘟疫流行、軍閥混戰、愚昧麻木、貧病交加、閉塞保守、迷信排外、自私狹隘、社會失序、死亡接踵，等等。這裏幾乎就是人間地獄，是一個亟待現代文明診斷、治療與拯救的所在。

那麼，《面紗》將中國社會敘述成一個前現代的疾病社會的意義何在？尤其是在全球化時代，人們不僅在強調文化多元，而且也強調現代化的多元，《面紗》這樣的敘述有甚麼意義？從影片中不難看出，正是因為中國的疾病，一個具有理性的科學品質、犧牲精神與濟世情懷的西方人沃特的出現才有了歷史的價值：只有沃特才能將疾病的中國社會從混亂、疾病、骯髒、愚昧、麻木與死亡中拯救出來，而沃特也會因此而成為耶穌似的中國社會的救贖者。沃特是一個科學家，一個具有很高天賦、對科學充滿迷戀的科學家，這種科學迷戀也導致了他日常生活中情感世界的相對枯燥。吉蒂的不忠帶來的不僅是他的生活的危機，而且是他自我認同的危機，是對他關於科學家的社會形象的威脅。於是，他要去中國內地。這一行為不僅是逃避生活危機，也是他要完成自我救贖的行為，完成其科學家權威的重構行為。來到中國內地的沃特與在上海的沃特比較起來，發生了一個重大的變化，那就是在上海的沃特只是一個科學工作者，而在中國內地的沃特則是一個懲罰者、救贖者、科學家、人道主義者、聖人的統一。在這個內地世界，沃特還在執著於自己的科學研究，無論是在田野調查、實證研究中，還是在日常生活中，他都堅持著科學精神。與此同時，他無視當地傳教士勸告，執著地要說服當地人改變他們的生活習慣、傳統風俗以及社會的混亂狀態。在他的努力下，人們不僅改變了生活習慣，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重建一種生活秩序。因此，《面紗》不僅在敘述一個情感故事，而且敘述一個通過科學與愛建構生活世界與社會秩序的故事。

如果將這個故事納入到全球化語境中，人們不難看到其中全球化想像的特點。首先這個全球化想像還是建立在西方話語與價值觀的基礎之上。這種價值觀以其理性、人道、民主、社會秩序、人權、自由、愛等為基本核心。按照這種價值觀，全球化需要以此為基礎來建構。在這種價值觀的視野中，與西方不同的文化想像與生活方式則被視為前歷史的。不僅不能有效地建構社會秩序，而且不能充分地保證人們避免生活中的災難與疾病。其次，當人們持有這樣的價值時來觀察世界時，世界就會被呈現兩個世界，一個是前歷史的、混亂、失序、疾病、災難、貧窮乃至於死亡的世界，一個是雖然會有個人情感不幸，卻依然是理性、文明、自由、有序、生活幸福的世界。後一世界正在通過聖徒般的人物進入前現代世界中，將文明世界的知識、科學、秩序觀念傳播到這個世界中，改造著這個世界，使之具有一些人性的內容，並具有一定的社會秩序，在一定程度改變了前現代社會不符合現代文明的生活習慣、宗教迷信等。最後，前現代社會在影片的全球化想像中幾乎還是處在沉默的狀態。影片鏡頭語言的一個典型特點就是幾乎所有的前現代社會的存在者都沒有清晰地進入人們的視野中，他們或者以群體的、模糊的面目出現在鏡頭中，或者只出現遠景中，而幾乎沒有出現在近景中，他們無法有效地表達自己生活方式與價值觀念的合理性。這意味全球化世界的想像是採取多元化言說修辭的，而是整個世界東方應當按照現代西方文化標準來進行分類，作出價值評價、甚至相應敘述其在歷史中是否具有存在的合理性。

影片拍攝於2006年，其時中國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中國作為一個世界大國的形象成為中國自我表述的核心，中國也一直力圖通過和平、負責任、和諧、平等、溝通協商等話語向世界敘說著自己的全球化設想和自我表述的核心，並努力通過各種途徑使這種表述成為世界理解中國形象想像的主要修辭。雖說世界對中國的形象還存在一定的疑惑，但這種敘述畢竟已經成為一種很重要的中國敘述。至於這一歷史語境，《面紗》沒有將中國的現代化自我敘述作為其核心語彙，而是依然延續著將中國疾病化的現代修辭，原因何在？這是一個令人迷惑的問題。儘管《面紗》主觀上並無意於妖魔化中國，但正是這種無意讓人不得不震驚於西方的中國疾病化修辭是如此深入地影響了西方的中國想像、以及受此影響的中國現代文化的自我表述。儘管影片敘述的是前現代的中國內地，其運用中國疾病化的修辭似乎有一定的歷史根據，因為那個時候的中國似乎正是處在那樣的不文明、多種疾病纏身的狀態之中，然而這種前現代中國的形象本身是意識形態敘述選擇、加工與想像的產物，其目的不外乎將中國在現代世界中邊緣化，為現代文明在中國進行傳播、診斷、治療提供必要的話語資源，也為西方進入中國進行殖民統治提供了正當性與合理性話語資源。<sup>4</sup>換句話說，根據此影片的文化邏輯，前現代中國是混亂、疾病、迷信、戰爭和封閉的中國，現代化則是科學、理性、人道、人性、高尚的文化，後者不僅能發現與診斷前現代中國的疾病，而且治療這一疾病。

從根本上說，《面紗》即使在敘述前現代中國社會時也是非常片面地觀察其歷史與現實，運用了長期以來人們約定俗成的常識化敘事，即將前現代中國敘述成為落後、疾病、迷信等所控制的敘述，忽視這個世界中人們的生存現實、情感表達、倫理生活、鄉鄰社會結構秩序、文化意義的獨特訴求等一系列的歷史與文化特點。如果比較中國當下電影的自我敘述，人們不難看到《面紗》與關於中國內地的敘述幾種情況之間的區別。一種是中國主流意識形態的中國敘述。這一敘述將中國內地敘述為正在進行現代化建設的空間。中國民間社會與政府之間固然有著衝突，但他們在共同目標和現代化渴望方面卻是一致的，如《遠山的呼喚》等。一種敘述採取了日常生活與民間關切的敘述視角，敘述中國大歷史之下普通的日常生活危機、生存的執著等，表達了巨大的歷史變化給人們生活帶來的焦慮與生活空間的重構，如《圖雅的婚事》。一種敘述將中國社會、尤其是中國內地奇觀化，極力渲染民俗風情、自然

景觀等，將中國敘述成全球化世界中一個不可複製的消費景觀，如《喜馬拉亞王子》。與上述幾種中國形象的影像敘述不一樣，《面紗》將中國疾病化的修辭有一個明顯的不同，那就是這是一部置身於西方視野的影片，一種從已有的現代文明成就出發，回溯中國社會前現代的特徵，具有這一特徵的中國是消極的、落後的、被動的、缺乏文明的中國。而上述中國影片則更多將現代文明視為中國的未來，力圖通過人們的自我努力實現這個前景，因此，儘管比較現代文明，中國社會還有許多不盡如人意之處，但中國不僅已經走在現代文明實現的道路上，而且中國人正在為實現文明主動、積極的努力著。這樣一來，中國形象就具有了積極的、進步的、主動的、情感的、生活的意義。

## 二 《通天塔》：多元抑或西方中心的全球化

這種西方文明強勢的全球化敘述不僅出現在《面紗》中，2006年一部被人們廣泛認可的影片也採取了近似於這種全球化想像的模式，這就是《通天塔》。《通天塔》講述了一個有關全球化社會遭遇多種文明的故事。十二個人、三個國家、四種不同的命運、一次偶然的事件，皆源於那一聲無意的槍響，命運交織的羅網將不同種族、地域、文化背景下的靈魂納入其中。北非摩洛哥農民用一隻羊從鄰居那裏換來了一把獵槍，這支槍是日本遊客送給鄰居的。父親把槍交給兄弟倆讓他們牧羊時嚇唬狼和老虎。兄弟倆拿著槍在山上試來試去，試著槍的射程。槍射中了遠處山路上開來的一輛旅遊巴士。此車上坐滿了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其中一對美國夫婦理查與蘇珊，他們為了挽救瀕臨崩潰的婚姻，把孩子留在美國，由墨西哥保姆照顧。儘管經過了激烈的爭論和內心的掙扎，兩人依然不能解決感情矛盾，正搭巴士奔向下一個目的地。悲劇突然降臨，一顆子彈穿過車窗，擊中了妻子。為了挽救蘇珊，理查千方百計四處求救，怎奈人生地疏、語言不通，任何一件簡單的情況解釋起來都遇到重重障礙。美國政府很快得知消息，立即展開外交求援；當地的警員也迅速發現了肇事的父子，將三人包圍在山坡。與此同時，遠在美國家中的墨西哥保姆很想離家長達9年之後回去參加兒子的婚禮。於是，她說服侄子陪她帶著理查的兩個美國小孩兒同回墨西哥。在路上，由於國籍、人種及語言等原因，他們被警員當成綁架孩子的嫌犯而遭追捕，繼而又與小孩失散。遙遠的日本，曾贈與非洲朋友步槍的日本人亦面臨著重重的困境，妻子自殺、聾啞的女兒自閉，並且還靠勾引她遇到的每個男人來宣洩心中的痛苦。短短的十一天中發生的事情幾盡濃縮了這世上所有的不幸，而所有的不幸幾乎源於溝通的不暢。

這部影片被人們視為關於全球化是集中各種衝突的一個集中而富有成效的影像再現：移民問題、恐怖主義問題、文明衝突問題、發達社會中個人主義衝突的問題、國家權力與個體權利的衝突問題、貧窮問題、人們之間的交流問題以及家庭問題等。人們在影片中可以看到不同文明的人不僅處在不同的生活世界中，有著不同的問題，具有不同的生存焦慮，並因此造成生活世界乃至與社會結構的緊張。人們還可以看到處在不同文明的人也在相互影響，彼此之間既在造成巨大的衝突，也在尋求著共同的交流與解決衝突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影片把當代世界問題的出現沒有簡單的置於西方化的視野中，而是置於全球化時代獨特的問題域中。首先，全球化時代的問題決不只是西方文明一直所強調的非西方國家、非西方文明傳統過於保守、頑固、專制而造成的，西方的民主和自由社會並不是沒有問題。非西方社會問題的根源同西方社會並不是沒有關係。當那一支槍是日本人留下時，這就意味著非西方世界中的暴力和失序同發達國家是有密切關係的。這種敘述時也無疑同西方長期以來將非西方世界非理性化、失序化、恐怖主義化、落後化等敘事是大相逕庭，也同西方的非西方敘事常常將非西方世界、乃至於整個世界的問題歸結非西方傳統的觀念是頗為不同的。

其次，影片展示了全球問題的多元性。在不同的文明與國家中，社會與生存問題雖然性質是不相同的，但都存在著眾多的問題，這些問題並沒價值高低和進步與否等區別，都是當代世界中不可忽視的問題，如果沒有更好的處理的話，這些問題所激發出來的破壞力就是全球化的。在美國社會，既有移民問題，也有個人主義張揚所帶來的人們生活世界中的不穩定，以及個體之間圍繞權利而產生的持續不斷的衝突，這種衝突正在導致家庭的解體。強烈的個人主義訴求也使人們在他人遇到危險與困難時無視他們的要求，採取冷漠的態度與自我保護措施。當理查夫婦在摩洛哥遇到危險時，他的眾多同胞為了一些傳說中的恐怖故事，置處在生命危險中蘇珊於不顧，拋下他們兩人，偷偷將旅遊汽車開走。作為處在高度發達的日本，其社會中普遍存在的問題是人們之間表達焦慮與承認的困惑。父親的沉默與經常不在家、女兒的聾啞與無法為他人所承認、人們之間的冷漠與缺乏交流導致了這個社會中普遍壓抑。摩洛哥的貧困、無序、暴力、專制自然也是這個世界中的主要問題，墨西哥社會中的普遍移民以及近乎狂熱的越軌衝動等，都在給這世界製造更深的危險。各個不同的文明及國家都有著自己巨大問題。

第三，眾多的文明與國家內部的問題在全球範圍內產生著影響。他們已經超越了民族-國家的範圍，對其他民族的生活世界與文化傳統產生了重要衝擊。因此，解決民族-國家問題不能僅僅靠一種文明或者一個國家的力量就能實現的，需要全球範圍內的共同解決機制的建構。影片採取並行敘事的方式敘述了幾個家庭的不同遭遇和它們之間的聯繫。儘管只是幾個似乎與時代及全球化大敘事沒有多大關係的普通家庭，但它們的命運卻與這個全球化時代的重大問題聯繫在一起。每一個家庭、每一個人即使沒有任何自主意識、甚至已經忘記自己曾經做過的事，但他們還是對全球化關係產生了影響。一支日本人留下的槍，通過摩洛哥小孩的手擊中了美國人，而美國人的小孩又需要墨西哥的非法移民來照顧。這使得任何人所遇到的問題都具有了全球化的色彩，並需要動用全球化力量來解決。蘇珊受傷了，既需要摩洛哥人來照顧，也需要摩洛哥的醫生來止血，還需要日本警員和摩洛哥警員的調查，而留在美國國內的孩子則需要墨西哥保姆來看護和美國警員來尋找。一個家庭牽動了全球化的力量。同時蘇珊的受傷還牽引起不同文化之間的衝突與交流，阿拉伯文化、美國文化、拉美文化、日本文化，各種文化在處理蘇珊的事件上也表現出不同的特點。

從上述分析中不難看出，《通天塔》的全球化想像已經超越了簡單的西方化視野，也超越了現代化的歷史進步主義自信，而是將不同文明、不同歷史階段的問題都置於一個平等表現的平台上，即將全球化世界展示為不同問題共同構成的世界，同時也表現了這些問題是全球化語境中共同面臨的問題，任何文明都不能夠簡單通過將這些問題前現代化、非理性化就可以擺脫自己對之的責任。但即使如此，《通天塔》的全球化想像也依然存在著西方化的話語控制的特點。這裏不擬對這種西方化話語霸權進行詳細分析，只考察這部影片關於摩洛哥的敘事。

影片中摩洛哥似乎可以用暴力化、貧困化、前文明化等詞語來表達。在這裏，一個年齡很小的孩子就開始用槍，儘管他們對槍的意識還是很朦朧的，但他們已經明白了槍對自己為別人所承認的重要性，並且積極地通過槍來顯示自己的能力。因此，他們從沒有將槍與暴力、不正當等聯繫起來，從而反思使用槍與現代暴力之間的關係。與此同時，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人們從電影中都可以推測出暴力與貧窮之間的因果關係。摩洛哥警員將暴力作為執法的基本方式，沒有經過任何正當的程式就對嫌疑人施加暴力，甚至使用武器。這些都使摩洛哥世界中充滿著暴力與危險。無論是否是偏見，當一群旅客因為蘇珊的受傷被迫滯留在一個摩洛哥小鎮時，旅客中紛紛傳聞的關於大量外國人在阿拉伯世界被殺的消息都在強化著摩洛哥

的恐怖氣氛。鎮上民眾的冷漠、怪異的表情也使人感到這個世界中隱含著某種危險。

可以說，影片雖然無意於將摩洛哥世界恐怖主義化，但整個關於摩洛哥世界的影像再現的氛圍確實使人不能不深刻體會到其中所隱含的恐怖主義危機。荒漠、破爛的小屋、襤褸的衣裳、猥瑣的人群、貧瘠的山坡、赤身裸體的孩童等都將摩洛哥的貧困展現在人們的面前。如果說影片表現這種貧困是儘量減少西方意識形態的先見，那麼影片雖然沒有將貧困視為當地傳統影響的結果，卻很明顯地將這種貧困視為這個世界不安定的原因，甚至是已經現實地表現出來了。正是因為貧困與環境的閉塞，這個荒漠中的人才如此無知使用暴力。從某種意義上說，在摩洛哥世界的影像再現中，暴力的出現並不是偶然的現象，而是這個貧困世界的基本生存方式。同時影片也一再表現摩洛哥世界未開化的情形，弟弟偷窺姐姐身體，姐姐有意讓弟弟偷窺，治療傷口請來的是牧醫，圍觀外來旅客，等等。儘管影片安排了一個能講英語的摩洛哥人，他不僅對外來文化有所瞭解，而且具有一定的開放與理性態度，從而為理查夫婦在摩洛哥世界中提供了一個安全的場所，但整個摩洛哥世界的封閉、麻木、愚昧依然是觸目驚心的。

影片沒有將摩洛哥世界的暴力化、貧困化、未開化的狀態視為摩洛哥文明的結果，而將之視為整個世界關係的產物，是全球化世界中存在的問題，但問題是為甚麼這個世界會被呈現為暴力的、貧困的、前文明的狀態？文明到底是甚麼樣文明？無疑這裏有一個潛在的預設，那就是現代西方世界中固然有著大量的問題，並且要對全球化世界中存在的一些問題負責，但西方化的世界畢竟還是佔住了當代世界正當性與合理性的資源。從影片不難看出這個傾向。首先，這是一個西方人進入摩洛哥旅遊時發生的事。儘管這只是旅遊，但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說，西方旅遊如同西方世界當初在全球各地冒險；和後來的人類學研究一樣，是一種典型的西方話語認知、言說、再現、整合世界的形式。通過旅遊，西方不僅發現了世界，而且敘述了世界，使世界按照西方話語方式被再現出來。影片非常清晰的表現了西方文化能有效表述世界的傾向。理查夫婦雖然只是遊客，但他們卻有關於摩洛哥相當豐富的知識，其他遊客也能在各種傳聞、媒體報導中知曉摩洛哥。遊客在理查夫婦遇到困難時的談論可以見出這點。

影片中一個頗值得注意的細節就是蘇珊本來與理查之間的情感已經有很深的裂痕，但在旅遊車上看到幾乎蠻荒的沙漠上幾個穿著白衣的阿拉伯婦女時，她被感動了，情不自禁地握著理查的手。這裏感動她的當然不是阿拉伯婦女身上的精神，或者阿拉伯文化，而是那些女性在蠻荒的沙漠中行走時所顯示出來的艱難與貧困的情狀，使她領悟到自己現在擁有的生活是值得珍惜的。在蘇珊受傷時，理查曾經得到摩洛哥人的照顧，摩洛哥人向理查講述了摩洛哥小鎮的風俗和文化。在這一講述之中，問題不是需要通過英語來交流，而是摩洛哥人所使用的語彙基本上是西方文化的語彙，同時理查在交流中也是能充分的、真實的、沒有障礙的理解的態度。為何理查能充分地理解摩洛哥人的表述呢？這只能是由於摩洛哥人的表述符合理查關於摩洛哥的期待視野。一種文化的意識形態在這裏悄然流露出來。正是這種旅遊中的視角將這種文化的價值偏好蘊含其中，並通過這種視角來再現這個世界。

比較墨西哥人在美國的遭遇，不難看出這種旅遊文化所具有的世界再現的價值偏好。墨西哥保姆雖然已經在美國住了很長的時間，但她幾乎沒有真正敘說美國的能力，也沒有獲得再現美國的視角。她不僅不具有在美國駐留的合法權利，而且它基本被排斥在觀察與言說美國社會之外。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就是當他回到墨西哥參加兒子的婚禮時，當別人希望她敘述美國時，她能說的只有主人的家庭和孩子，其他的幾乎都沒有甚麼可說的。保姆沒有為人們提供任何一點更加有效的美國形象敘述。事實上，當保姆被美國警員拘捕時，她幾乎無法說清楚任何東西，當然也無法說清楚自己在這個世界中的身份。她的身份需要主人的承認和法律

的認可，而這兩者卻是她所無法擁有的。同樣是沙漠中的不幸遭遇，比較美國政府營救理查夫婦和摩洛哥政府全力照顧他們，保姆既沒有得到墨西哥政府的任何幫助，也沒有得到美國政府的任何照顧，理查夫婦在沙漠的遭遇是生活的重建，而保姆則是更悲慘生活的開始。影片中墨西哥人關於美國的印象基本上就是主流傳媒所建構的美國之夢的形象。

其次，當人們將目光投向這部影片中關於全球化應當有的交流方式與可能的整合力量時，人們不得不驚訝於影片提供的可能性只有一個，那就是來自西方的力量。世界處在問題叢生之中，但很明顯無論是摩洛哥還是墨西哥都不能提供解決問題的方式與力量。這需要美國的介入。影片中最終解決衝突的力量是美國的直升機和美國的警員。在這種解決方式中，摩洛哥人只能成為圍觀者，而墨西哥保姆則成為被放逐者。如同《面紗》一樣，理查和蘇珊這對本來已經出現裂縫的夫妻在這次第三世界歷險中再次喚起彼此的愛意，一個理想的生活世界和社會秩序在他們的情感恢復與家庭團圓中冉冉升起。儘管這個世界可能依然還有許多矛盾，儘管移民依然在邊境線內外掙扎著，儘管摩洛哥可能還處在生存壓力與暴力統治之中，但生活的理想和人性的世界還是可能的，不過這種世界是要由西方文化與社會來提供和保護。

總而言之，中國電影如同其他國家的電影一樣也在言說著一個全球化的社會，言說著全球化社會給中國的全球想像與中國的社會想像帶來的變化及其可能性。中國電影置身於悠久的傳統和全球化世界中時，置身於大國崛起的夢想與現代屈辱的歷史回憶中，它所提供的全球化想像既要強調中國在全球化社會建構的作用和歷史性價值，卻又不得不面對著全球化已經形成的西方話語權威。這種歷史語境決定著中國電影的全球化社會秩序、生活世界，以及有關全球化社會整合力量與規範方式的言說，都會處在比較複雜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中國電影有著強烈的關於全球化歷史、全球化規範敘述的衝動，並逐漸認為能夠為這種全球化敘述提供至少是另一種可能性和多元的價值基礎。另一方面中國電影也受制於中國現代歷史與當下中國在全球化結構中的位置所限制，並不能提供獨立的、有效的全球化言說，而或明顯或潛在地要按照已經被視為真理的西方話語模式來敘述自己關於全球化的想像。這些話語包括理性、科學、民主、法律、權利、共識，並在這種社會建構基礎上容納倫理、交流、對話、多元等。儘管存在這種矛盾與想像困境，但中國電影已經開始了全球化敘述，並且能在這種全球化敘述中重構中國的社會想像，這無疑是全球化影像敘述對中國影響的積極價值。

## 註釋

- 1 楊念群：《再造「病人」》（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是書討論了西方醫學關於中國形象的描述與現代中國社會、政治之間漫長的歷史關係。
- 2 [英]齊亞烏丁·薩達爾（Ziauddin Sardaer），馬雪峰、蘇敏譯：《東方主義》，（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頁160-165討論了美國電影對中國的疾病化修辭。
- 3 李希光：《妖魔化中國的背後》（台北：捷幼出版社，1997），是書討論了美國媒體中的中國形象。
- 4 薩義德（Edward W. Said），王宇根譯：《東方學》，（北京：三聯書店，1999），該書中詳細地討論了西方各種話語，包括人類學、歷史學、遊記等再現形式，指出這些再現東方的方式與其殖民主義統治之間的關係。

吳海清 北京舞蹈學院副教授

張建珍 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七十期（2008年1月31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